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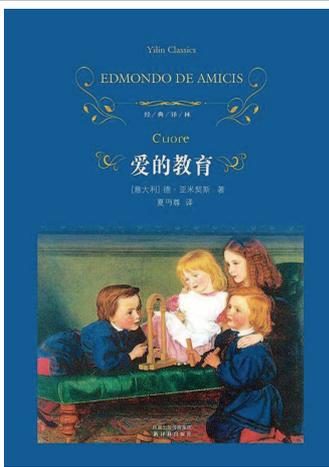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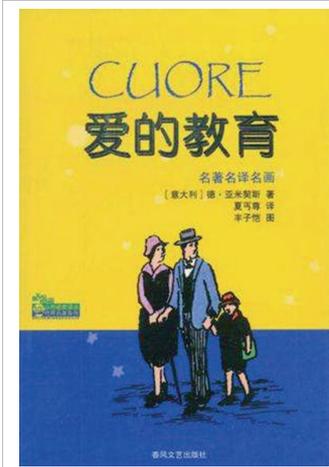
夏丏尊的两部译著

■宋志坚

1932年1月1日出版的《中学生》新年号，有鲁迅的《答〈中学生〉杂志社问》。

说是鲁迅答《中学生》杂志社问，其实就是鲁迅与主持《中学生》杂志社编务的夏丏尊、叶圣陶等人与《中学生》读者的对话。对于鲁迅所说，夏丏尊当有切身感受。那时候，国民党当局对意识形态的控制相当严厉，夏丏尊有两部译著——《爱的教育》和《国木田独步集》，居然也成了控制对象。

《爱的教育》是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的日记体小说，原名《考莱》，意大利语“心”的意思，原书在1904年已有近300个版本，各国几乎都有译本，书名并不一致，如日译本就名为《爱的学校》。1923年，夏丏尊在春晖中学任教时，将此书由日译本译为中文，在上海《东方杂志》连载，后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26年3月改由开明书店印行，列为世界少年文学丛书之一。夏丏尊在《译者序言》里说，他在1920年得到这部小说的日文译本，一边读一边流泪。因为“书中叙述亲子之爱，师生之情，朋友之谊，乡国之感，社会之同情，都已近于理想的世界，虽是幻影，使人读了觉到理想世界的情味，以为世间要如此才好”。所以他当时就许愿，一定要把这部小说译出来，不光是给孩子们读，还要介绍给父母和教师们读，让父母和教师都跟他一样，流一些惭愧的眼泪，感动的眼泪——他认为这比给孩子们读更为重要。这本书之所以引起夏丏尊的共鸣，因为这种“理想世界的情味”，与他的教育理念正相吻合。从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到春晖中学，



各种版本的《爱的教育》，夏丏尊译

再到立达学园和暨南大学，在他的教育生涯中，就一直贯穿着“情爱”二字。他在开明版《爱的教育》的《译者序言》中就把办学校比作是“挖池塘”，把“情爱”比作是池塘里的水。他说：学校教育“好像掘池，有人说四方好，有人说说圆形好，朝三暮四地改个不休，而于池的所以为池的要素的水，反无人注意。教育上的水是什么？就是情，就是爱。教育没有了情爱，就成了无水的池，任你四方也罢，圆形也罢，总逃不了一个空虚”。

《爱的教育》一出版就受到教育界的重视和欢迎，许多中小学把它定为必读的课外书，许多教师认真地按照小说中写的来教育他们的学生。直到今天，还有教育工作者认为，“在中国现代文化

教育史上，夏先生最大的贡献，也许正是把这本书带到了中国”。

国木田独步是日本小说家、诗人，一生写了几十部短篇小说和大量诗歌、评论、书简、日记等，其深受华兹华斯的唯情论和“返回自然说”的影响。处女作《源老头儿》写一个孤苦伶仃的老人因收养的少年乞丐离他而去，失去精神的寄托，终于自杀。《牛肉和马铃薯》反映知识分子的苦闷。《春鸟》塑造了一个热爱大自然、向往自由的“白痴”少年的形象，并对他寄予深切的同情。《穷死》和《竹栅门》是他晚年的代表作，真实地反映了劳动群众贫困的生活。其早期作品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抒情风格，以后转向现实主义，有些作品则带有自然主义倾

向，流露出感伤、悲观的情绪。《国木田独步集》则是夏丏尊翻译的国木田独步的短篇小说集，内收小说五篇，1927年8月由上海文学周报社出版，开明书店发行，书前有关于国木田独步的导言。

鲁迅曾多次为夏丏尊的这两部译著成为国民党实行文化专制的牺牲品鸣不平。1933年11月3日，他给郑振铎的信中说，“连《国木田独步集》也指为反动书籍，你想怪不怪”。1933年11月14日，在给日本友人山本初枝的信中说：“上海依然很寂寞，到处呈现不景气，与我初来时大不相同。对文坛和出版界的压迫，日益严重，什么都禁止发行，连亚米契斯的《爱的教育》，国木田独步的小说选集也要没收，简直叫人啼笑皆

非。我的作品，不论新旧，全在禁止之列。当局的仁政，似乎要饿死我了事。”1933年12月5日，鲁迅在《上海所感》这篇杂文中揭露这种文化专制主义时，又说到夏丏尊的这两部译著：“用笔的人更能感到的，是所谓文坛上的事。有钱的人，给绑匪架去了，作为抵押品，上海原是常有的，但近来却连作家也往往不知所往。有些人说，那是给政府那面捉去了，然而好像政府那面的人们，却道并不是。然而又好像实在也还是在属于政府的什么机关里的样子。犯禁的书籍杂志的目录，是没有的，然而邮寄之后，也往往不知所往。假如是列宁的著作罢，那自然不足为奇，但《国木田独步集》有时也不行，还有，是亚米契斯的《爱的教育》。不过，卖着也许犯忌的东西的书店，却还是有的，虽然还有，而有时又会从不知什么地方飞来一柄铁锤，将窗上的大玻璃打破，损失是二百元以上。”

夏丏尊并不是职业政治家，也不是对政治有特别兴趣的人，他有强烈的正义感，却没有政治背景；他的译著《爱的教育》与《国木田独步集》也没有鲜明的政治色彩。鲁迅以夏丏尊的这两部译著作为典型事例，十分准确地说明当年的国民党政府搞文化专制主义，已经到了神经过敏的地步。

当然，无论是鲁迅，还是夏丏尊，都不会屈服于这种政治上的高压。1935年，瞿秋白遇害后，鲁迅抱病编辑瞿秋白的译文集《海上述林》，就得到夏丏尊以及郑振铎、章雪琛、叶圣陶等人的资助。这是对于烈士的纪念，也是对于屠伯的抗争。

老舍写过一篇文章名为《船上——自汉口到宜昌》，发表在1938年10月16日第七十七期的《宇宙风》上。文章叙述了1938年7月30日他从汉口坐船至宜昌的见闻与感想。与老舍同船而行的有何容、老向、萧伯青，后面三位都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同事。此时的老舍担任在武汉成立的文协理事。由于战事紧急，担心武汉无险可守，因此在冯玉祥、邵力子的支持下，老舍等人携带文协的文件、名册、账目等资料赶赴重庆。由于无直达船只，加之人多船少购票紧张，因之在宜昌滞留了一周左右。老舍这篇文章以往很少有人关注他所乘船只的具体信息，笔者在考证相关资料过程中，发现弄清船只信息对理解文章有一定帮助。

萧伯青的回忆文章《老舍在武汉重庆》中写道：“早上起来在甲板上眺望，浩浩江水，经初升的旭日一照，霞光云影，迷茫一片。江轮很是安静平稳。这是一艘上海三北公司的轮船，却挂了一面意大利的国旗，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意识，随时流露。”据此可知，老舍乘坐的是三北公司的轮船。

老舍、萧伯青的文章共同提到，中国船挂意大利旗帜，是为了寻求保护，降低危险系数。三北轮埠公司与意大利驻沪领事合作组织中意轮船公司，因此沿江各分公司的房产码头仓库都挂起意大利旗帜。这种所谓的合作，意大利基本上什么也不出，三北方面无非是看重意大利与日本是同盟国，二者各取所需罢了。而这种所谓的合作在老舍看来，是特别能激发国耻情绪的。

抗战期间，由于政府征用、日本人轰



老舍

炸或被敌掳走，三北轮埠公司船只毁损严重。《三北轮埠公司史料选辑》（蔡志坤整理）以及其他史料文章记录了毁损船只名称，如龙山轮、衡山轮、嵩山轮、华山轮、龙安轮、宁兴轮等。从被炸毁地点看，只有龙安轮是在1941年8月8日被炸于宜昌三斗坪。从行驶于长江沿线，炸毁地点以及老舍的描述看，基本可以锁定是龙安轮。

老舍对这条船印象不佳：

船只有轮廓。一切零件，久已残落，决不修补，门上没柄，壶上没嘴，净桶没边沿，椅子没靠背，床前没号数，电灯没开关……这船的轮廓要把几百条生命送到宜昌去。票价很贵；此外，一律须加“不”字。饭不能吃，开水不开，出恭不方便……污辱中国

船上的老舍

■朱洪涛

的江，中国的人，岂止是日本暴敌呢？

老舍在《八方风雨》中形容“这是条设备齐全，而一切设备都不负责任的船”。《船上——自汉口到宜昌》一文还提到茶房的不负责任，“安闲自在”。这种情况的出现也是有原因的。据屠鼎芳、夏榕卿在《三北轮埠公司在汉口的经营活动》中介绍，三北公司所属各客货轮采取包缴制，即每月视各处业务多少规定各分公司的开销，超出部分总公司不予报销。包缴制某种程度就是层层剥削，如若不克扣则上上下下无利润可挣，这就造成船上服务员向旅客勒索酒资。这也就是老舍文章提到的，“酒钱是票价的五分之一，先付”。而茶房在这个体系里面是不支薪水的，他们每月的来源就是靠分润旅客赏给的酒资。本来就是国难当头，再加之这条中国船呈现出的种种可恶面目，也就更容易激发老舍批判无孔不入的侵略者、吸食鸦片烟的愚弱国民之行状。文章后面他把中国大好河山沦于敌手比喻成“被奸污了的美妇”，字里行间涌动着一股弱国子民的悲哀。而读萧伯青晚年回忆文章觉得此次行程颇有些许愉快之感：“饭厅内有好几张铺有白桌布的饭桌，开饭时七八人围桌一坐就吃起来。与同舟人随便聊天，感到愉快。有一对夫妇抱着一个娃娃，与我们同桌吃饭。他们用自己腌好的藟(jiao 四声)头也请我们吃，其状如蒜瓣，咬开的横断面却层层

如葱白，味亦非葱非蒜，我们还是头一次吃到这种南方小菜。”萧伯青并非不批判，只是人到老年回忆往事，纪实性笔下流淌着更多是温情。

老舍与萧伯青二人还有一点不同就是对武汉的态度。萧伯青的字里行间流露出对武汉的观感颇为不坏。而老舍在《船上——自汉口到宜昌》写到，“这里并不是我的家，可是我十分的爱她，特别是在轰炸后”，“离开武汉，奔往他处，是连想也不敢想的”。初一看，以为老舍很喜欢最少也是不讨厌武汉，然而笔者查阅老舍其他关于武汉的文章，感觉他对这座城市的观感很不佳。看他在《八方风雨》中的描述即可见一斑：

把个小一点的南京，和一个小一点的上海，搬拢在一处，放在江的两岸，便是武汉。武昌很静，而且容易认识——有那条像城的脊背似的蛇山，很难迷失了方向。汉口差不多和上海一样的嘈杂混乱，而没有上海的忙中有静，和上海的那点文化事业与气氛。它纯粹的是个商埠，在北平，济南，青岛住惯了，我连上海都不大喜欢，更不用说汉口了。

老舍评价黄鹤楼是“那么奇丑的东西”。实际上，老舍对武汉的感情可以分开看，他对这座城市的确没有太多好印象，但1938年各方朋友奔向武汉，尤其是老舍参与了文协，在这里他结交或是重逢了不少新老朋友，这里发生的人事令老舍难以忘怀，加之老舍这个人“最重友谊，越交越厚”（萧伯青语），老舍怀念的是武汉这段生活经历中弥足珍贵的人生意义而不是留恋这座城。这是读他的《船上——自汉口到宜昌》不可不注意之点。